

1881 至 1914 年的 东欧犹太移民潮与英国社会

王 本 立

内容提要 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居英国的行动,是在 19 世纪欧洲人口大流动和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背景下,随着俄国大俄罗斯政策的推行而发生的。东欧犹太人的大规模涌入,在英国引起了一场相当罕见、自下而上的反移民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本土犹太人不仅在总体上反对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居英国,而且从一开始就采取切实行动,在反移民运动方面做出了比非犹太人乃至英国官方更大的努力和实绩。

关键词 1881 - 1914 年 东欧犹太移民 英国 官方 本土犹太人

19 世纪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特别是 1881 - 1914 年这一时期,是犹太民族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东欧犹太人渐次告别故土,纷纷涌向西欧国家、大西洋彼岸和巴勒斯坦等地,从而引发了犹太民族史上的又一次大流散,特别是开启了犹太民族中心由欧洲向美国和巴勒斯坦转移的历史进程。关于犹太人的这次大流散,值得国内学界探讨的区域和角度甚多。本文将要探讨的是,这次大流散乃至东欧犹太人大规模涌入英国的基本缘由和概况,以及该时期东欧犹太移民潮对英国社会的冲击与英国社会对东欧犹太移民潮的回应。这样的探讨,不仅是对国内上述时期英国史和犹太史研究的一种深化与细化,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长期困扰人类社会的移民问题的理解。

一、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及涌入英国的缘由

东欧犹太人移居英国的零星行动,最迟从 19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有学者认为,在那个时

此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4JZDH0031)。

需要指出的是,东欧犹太人迁入英国的行动是在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多方位外移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关于东欧犹太人涌入英国的缘由,只有在他们大规模外移的缘由中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关于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缘由,国内学界不是没有过阐释,但据笔者的考察,由于受主题和行文限制,已有的阐释大体上只是着眼于集体迫害,把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起因归结为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陡然升级的反犹太主义。实际上,这种貌似合乎逻辑的阐释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因为它们存在三个明显的视野问题,一是未能发现乃至揭示东欧犹太人在 1881 年之前的外移情况与 1881 年之后的外移情况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未能发现乃至揭示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与同时期欧洲人跨大西洋移民潮之间的内在联系,三是未能发现乃至揭示俄国反犹浪潮与同时期大俄罗斯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结合行文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缘由做出尽可能贴近事实的简要梳理和分析。

候,移居英国的犹太人绝大部分来自德国和荷兰。此后,移居英国的东欧犹太人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在 1865 - 1875 年开始超越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犹太人,成了英国新增犹太成员中的大多数。另有学者估计,在 1860 - 1883 年之间,约有 1.9 万名犹太人从欧洲大陆迁入英国,其中 1.2 万人来自俄国和波兰,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

如上所述,东欧犹太人移居英国的行动在 19 世纪 60 - 70 年代已经颇具规模。不过,相比之下,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发生于 1881 - 1914 年。具体说,这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开始于俄国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结束于英国《外侨限制法》的出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据各种估计,1880 - 1914 年,移居英国的东欧犹太人大约在 10 万 - 15 万之间,远远超过了原来大约 6 万的英国犹太人口总数。因此,对于英国犹太社团来说,东欧犹太人的加入无疑是一场人口革命。

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居英国的行动,有其复杂而宏大的国际背景。

首先,它是在欧洲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发生的。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为了谋生或谋求更好的发展,欧洲人向以美洲国家为主的新世界大举移民,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史所罕见。唯其如此,这场移民运动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为重大的人类历史进程之一。在这一时期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1870 - 1914 年。因为,就欧洲而言,虽然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此前已经发生,此后也没有终止,但真正的移民洪流却是出现于这一时段。这是因为,受工业化时期各种因素的驱动,特别是凭借铁路网络和蒸汽船运输带来的便利,大批欧洲人加入了这场被认为是欧洲史上空前绝后的移民活动。其中,一部分人只是在欧洲范围内跨国界流动,更多的人则或直接或几经辗转漂洋过海,奔赴美洲——特别是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据估计,仅穿越大西洋的移民就多达 5500 万。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移民洪流具有很大的往复性。因此,在这 5500 万人当中,许多人曾多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而大约 40% 的人最后还是回到了欧洲。由此可知,移居英国的东欧犹太人,只不过是这场移民洪流的小小一部分罢了。

其次,更具体地说,它是在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背景下发生的。东欧犹太人的外移,如前文英国吸纳移民的情况所示,也是由来已久,其规模也不容小视。不过,真正的洪流却是出现于 1881 - 1914 年。正如欧文·豪所言:“从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3 年中约有 1/3 的东欧犹太人离开故乡——近代犹太历史上的这一迁徙,只有西班牙驱逐令所造成的大逃亡可以比拟。”这场移民洪流,可以说揭开了犹太人的中心由欧洲向巴勒斯坦和美国转移的序幕。在这一时期,东欧犹太人发动了犹太史上的前两次阿利亚(Aliyah),亦即移民巴勒斯坦的行动。其中第一次

劳埃德·P. 加特纳:《英国的犹太移民,1870 - 1914》(Lloyd P. Gartner, *The Jewish Immigrant in England, 1870 - 1914*),伦敦和底特律 1960 年版,第 38 页。

大卫·费尔德曼:《1840 - 1914 年的英国人与犹太人: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David Feldman, *Englishmen and Jews: Soci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1840 - 1914*),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 页。

W. D. 鲁宾斯坦:《英语国家犹太史:大不列颠卷》(W. D. Rubinstei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Great Britain*),麦克米伦和圣马丁 1996 年版,第 95 页。

约翰·M. 甘德:《19 世纪后期的经济起因与英国移民》(John M. Gander, "Economic Causation and British Emigr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 44 卷,1984 年第 2 期,第 608 页。

沃尔特·纽珍特:《横渡:1870 - 1914 年的跨大西洋大移民》(Walter Nugent, *Crossings: The Great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 1870 - 1914*),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页。

欧文·豪著,王海良、赵立行译,顾云深校:《父辈的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4 页。

(1882 - 1904 年)的移民数为 2.5 万人,第二次(1904 - 1914 年)为 4 万人。这两次阿利亚行动中的移民人数虽然不多,却不仅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倍增,而且标志着犹太人重聚巴勒斯坦的开始,意义极其重大。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大约 250 万东欧犹太人向西移民,其中 200 万人像欧洲的大多数其他移民一样,不仅以美国为首选目标,而且最终在美国成功定居。除了美国,东欧犹太移民西移的其他目的地还有英国、法国、阿根廷、南非等。其中移居英国者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因而,有人认为,对东欧犹太人来说,在整个大移民期间,除了美国,英国是他们的首选之地。当然,移居英国的东欧犹太人之所以比较多,与许多赴美的犹太人途经英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些人本来是想取道英国去美国,但由于路费不足、船主不肯继续前行等原因,从此留在了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有点像洪流经过的一个弯角,由于旋涡效应,在洪流渐消之后仍有较为可观的积蓄。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东欧犹太人的外移?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经济因素。在 19 世纪,东欧犹太人的口增长了 5 倍,其中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口从 100 万增长到了 600 多万,而他们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速远远无法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这种增长的失衡可以说是导致他们外移的基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和其他欧洲移民一样,他们离乡背井,通常是为了谋生或更好一些的发展。1881 年以前移居英国的东欧犹太人基本上属于这一情形。其次是政治与社会因素。在欧洲许多国家,犹太人许多时候既不见容于官方,也不见容于民间,东欧国家也不例外。而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导致犹太人的外移。1881 年以后,正由于东欧国家自上而下对犹太人多次发难,制造了许多集体迫害事件,才迫使大批受害的犹太人逃离家园,去境外谋生。1881 年后东欧犹太人外移的规模之所以会扩大,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再次是潮流因素。如前所述,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东欧犹太移民潮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实际上也囊括了前者的欧洲移民潮。既然如此,这两者之间应当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特别是后者应当对前者有相当大的带动作用。事实上,从前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这一点在两者的时间范围、主要取向、以及波动情况方面都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证明。

综上所述,即使在 1881 - 1914 年,经济因素和潮流因素都是导致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重要因素。而在国内已有的诸多译著及论著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却差不多完全是政治与社会因素,亦即东欧国家对犹太人所实施的集体迫害。这样的说法,无疑是受视野限制,将集体迫害的作用想当然地夸大了。

还有一个国内学界疏于深究的问题,这里也有必要予以简略分析,那就是,为什么会有集体迫害?

朱达·格里伯茨、爱德华·L. 格林斯坦、雷吉纳·斯坦因:《犹太史时间表:犹太历史上的重大人物及事件年表》(Judah Grinbetz, Edward L. Greenstein, and Regina Stein, *The Timetables of Jewish History: A Chronology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and Events in Jewish History*), 西门和舒斯特 1993 年版,第 307、342 页。

安德鲁·戈德利:《冒险精神与文化:1880 - 1914 年伦敦与纽约的犹太移民》(Andrew Godley, "Enterprise and Culture: Jewish Immigrant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1880 - 1914"), 《经济史杂志》第 54 卷,1994 年第 2 期,第 430 页。

科林·霍尔姆斯:《约翰·布尔的岛:1871 - 1971 年的外来移民与英国社会》(Colin Holmes, *John Bull's Island: Immigration and British Society, 1871 - 1971*), 麦克米伦教育 1988 年版,第 27 页。

凯瑟琳·琼斯:《英国的外来移民与社会政策》(Catherine Jones, *Immigr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 塔维斯托克出版公司 1977 年版,第 69 页。

杰伊·M. 皮尔泽:《犹太人与“血汗劳工”大争论:1882 - 1892》(Jay M. Pilzer, "The Jews and the Great 'Sweated Labor' Debate: 1882 - 1892"), 《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第 41 卷,1979 年第 3 - 4 期,第 258 页。

大卫·维涛:《锡安主义:成长的年代》(David Vital, *Zionism: The Formative Years*), 克拉林顿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2 页。

杰弗里·奥德曼:《近代英国犹太人》(Geoffrey Alderman, *Modern British Jewry*), 克拉林顿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2 页。

科林·霍尔姆斯:《约翰·布尔的岛:1871 - 1971 年的外来移民与英国社会》,第 27 页。

事实上,集体迫害的发生,绝不简单地是因为在亚历山大二世谋杀案的策划者中有一位名叫格西娅·赫夫曼(Gesia Helfmann)的犹太女性,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官方借以激发民间的反犹情绪,推行其集体迫害政策的有力口实罢了。集体迫害的长期延续,也并不见得是因为 1881 年以后的历任沙皇政府格外痛恨犹太人,而是自有其深层原因。

东欧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之所以从 1881 年起陡然升级,与这一年沙俄政局及治国理念的风云突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1881 年 3 月 1 日,推行自由主义改革多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随即继位,俄国政治从此急转直下,进入“反改革时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作为东欧犹太人的主体,俄国犹太人一度好转的命运也开始急剧恶化。

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初就已下定了反改革的决心。原因是,首先,在此前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俄国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使他对俄国的改革路线发生了怀疑。其次,他父亲作为改革的推行者,却在签署完一项新的改革方案的当天遭到暗杀。这使他更加认识到,在所有社会与政治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有任何的妥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统治俄国的 13 年时间里,亚历山大三世断然停止了以往的改革进程,坚决维护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与此同时,他还在帝国范围内大力加强和推广俄罗斯文化。在他看来,俄罗斯帝国的所有臣民应当在语言、文化以及外貌上都是俄罗斯人。因此,为了根除或侵蚀帝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种族与文化特征,他向他们推广极为强硬的俄罗斯化政策。俄国反犹政策的反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而且,此后俄国的反犹政策,本身可被看作是官方所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的一部分。比如,作为亚历山大三世的顾问,东正教会神父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策夫就曾提出过“将犹太人 1/3 消灭、1/3 驱逐、1/3 同化”的疯狂计划。这样的计划,归根到底,是服从于俄罗斯化政策的需要的。

认识到这些很重要,因为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找到集体迫害的基本原因,而且不难看出,在同期俄国的非俄罗斯族裔中,犹太人并非惟一的遭难者。如果我们仅以犹太人的遭遇为着眼点,而不做更深的追究,就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

二、非犹太人的反应与官方的应对措施

东欧国家自上而下的迫害,使东欧犹太人以空前的规模涌入英国。相应地,东欧犹太人的大规模涌入,在英国引起了一场相当罕见、自下而上的反移民运动,并且迫使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部限制移民入境的法律,即 1905 年《外侨法》(Aliens Act of 1905)。很难说这场反移民运动是一场反犹太主义运动,因为运动的主题是限制移民的流入,而不是仅仅出于民族或文化偏见,单纯地排斥或打击犹太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反移民运动实际上又是针对犹太人的。因为,当时英国的入境移民主要来自东欧,而东欧移民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以至于在一般的谈论中,东欧移民实际上等同于东欧犹太移

W. 布鲁斯·林肯:《俄国的亚历山大三世》(W. Bruce Lincoln, "Alexander III of Russia"),《当代历史》(History Today)第 26 卷,1976 年第 10 期,第 649 页。

W. 布鲁斯·林肯:《俄国的亚历山大三世》,第 644、647 页。

W. 布鲁斯·林肯:《俄国的亚历山大三世》,第 646 - 647 页。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 页。

民。因此,这场反移民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反对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入境的运动。同样地,1905年《外侨法》实际上也是一部针对东欧犹太移民的立法。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人从19世纪中期就已经遇到了令他们头痛的移民问题。以爱尔兰移民为例,1841-1861年净增40万,远远超过了1881-1914年东欧犹太人移居英国的总数,更不必说在《外侨法》出台之前的数字了。而且,爱尔兰人大规模移居英国的行动在英国也激起过强烈反响。可是,这种反响却不及东欧犹太人所引起的反响强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概括地说,是因为,一方面,东欧犹太人的自身特点使他们容易招致更多的关注和更为强烈的排斥情绪。另一方面,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气候更容易助长对类似东欧犹太人这样的外国移民的排斥情绪。

东欧犹太移民之所以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不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他们是地道的外国人,从外貌、服饰、语言到生活习惯,特殊性过于明显,很容易与当地形成强烈的反差。而爱尔兰人不同。他们自古就与英国人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交往频繁,彼此的认同感远非东欧犹太人可比。而且,由于爱尔兰当时尚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他们本身就是英国人。因此,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居民即使反感他们的到来,却很难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当外国人看待。其次,东欧犹太移民在英国的落户方式过于集中。爱尔兰移民的数量虽多,却分散在英国的许多工业城市里,容易疏散人们的注意力。而东欧犹太移民的数量虽然相对较少,却主要集中在伦敦、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等少数几个城市。不仅如此,在这些城市里,他们又主要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区域,如伦敦东区等。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容易引起当地人的注意和不安,也更容易使人们把就业、住房等社会敏感问题同他们联系在一起。再次,与爱尔兰移民仍然有所不同的是,东欧犹太移民的职业过于集中。衣物加工和家具制造是东欧犹太移民的两大职业。据估计,在1901年,伦敦东区的俄国和波兰移民中有42%的男性和54%的女性从事成衣加工,另有13%的男性从事制鞋业,还有11%的男性从事家具制造。其他各地也差不多如此。职业的过分集中,很容易引起同业竞争的加剧和当地同行的忌恨。更重要的是,东欧犹太移民从事的这两类职业,特别是制衣业,并非机器大工业,而是在条件极其恶劣、压榨程度极高、并且越来越受到非议和重视的血汗工场里进行的。当地的工人认为他们什么报酬的工作都肯干,不仅对自身构成排挤之势,而且严重影响工会事业的发展。而社会观察家们认为他们对血汗工场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大移民阶段,由于很多东欧犹太人只是把英国看作他们继续前行的中转站,所以,登陆英国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实际移

科林·霍尔姆斯:《约翰·布尔的岛:1871-1971年的外来移民与英国社会》,第26页。

参见R. I. 伍兹:《19世纪的英国人口》(R. I. Woods, "The Population of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迈克尔·安德森编:《英国人口史:从黑死病时期到当今》(Michael Anderson, ed., *Brit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 Day*),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凯瑟琳·琼斯:《英国的外来移民与社会政策》,第44页。

凯瑟琳·豪、基斯·麦克莱兰德、简·伦德尔:《界定维多利亚民族:阶层、种族、性别与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Catherine Hall, Keith McClelland, and Jane Rendall, *Defining the Victorian Nation: Class, Race, Gender and the British Reform Act of 1867*), 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杰伊·M. 皮尔泽:《犹太人与“血汗劳工”大争论:1882-1892》,第257页。

凯瑟琳·琼斯:《英国的外来移民与社会政策》,第110页。

杰弗里·奥德曼:《近代英国犹太人》,第121页。

杰伊·M. 皮尔泽:《犹太人与“血汗劳工”大争论:1882-1892》,第258-259页。

居英国者的数量。对不明就里的英国人来说,这种情况无疑强化了他们对“外国人侵入”迹象的忧虑,甚至是恐惧。

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气候之所以更容易滋生排外情绪,主要是因为,首先,在东欧犹太人大批涌入英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英国的经济萧条和高失业年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把社会问题 and 经济压力同移民联系起来。其次,当时正好是英国工人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在“新工联主义”者把注意力转向非熟练工人和低收入工人的时候,他们比平时更能感受到外国贫民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的压力。比如说,东欧犹太移民贫不择业,什么低报酬的工作都肯干,使有关行业的罢工很难收到实效,相应的目标也就很难达到。

针对东欧犹太人的反移民运动,就是在上述各种因素或背景下展开的。反移民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除了能够直接感受到犹太移民威胁的当地居民,还有一批社会观察家。

如前所述,东欧犹太移民对当地居民造成的心理压力和不满是多方面的。不过,最使他们难以容忍的应当是在职业方面。英国工人对东欧犹太移民的不满从 80 年代就已经存在,但最严重的抗议是从 90 年代初,随着新一轮移民高峰的出现而出现的。以伦敦为例,随着 1891 - 1892 年新一轮移民高峰的到来,有人认为,东欧犹太人正在“像蝗灾一样向我们涌来——掠夺本该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全国制靴制鞋业工会伦敦分会的官员们宣称,他们希望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以阻止“外国人的侵入”,因为“血汗工场原有的恶行……愈演愈烈”。各行业工会也纷纷提出禁止东欧犹太人入境的要求。受其影响,英国工会大会在 1892、1894 和 1895 年的年会上以东欧犹太人利用低薪手段抢走英国工人的饭碗为由,先后通过决定,反对自由移民。1900 年左右,由于更多的东欧犹太移民涌入伦敦,当地工人的反移民情绪再次高涨,并要求通过立法限制他们的入境。如此等等的强烈反应,无疑给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一帮社会观察家在制造舆论和促成移民法方面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反东欧犹太移民的代表人物、持右翼观点的作家和慈善家阿诺德·怀特(Arnold White)于 1888 年 6 月撰文指出,外国人正在侵夺英国人的职业,因此有必要阻断他们进入英国的步伐。同年,英国贸易委员会的劳工记者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t)在一份提交给下院的报告中,不仅描述了 50 年来伦敦东区血汗工场工人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情况,而且指出,由于大量外国贫民、特别是东欧犹太人的涌入,使上述情形变得更加糟糕。因此建议政府应当尽快做出反应,对移民入境给予必要的限制。一位名叫约瑟

据加特纳的估计,在英国做过短期逗留的东欧犹太人很可能 10 倍于实际移居英国的东欧犹太人。劳埃德·P. 加特纳:《英国的犹太移民,1870 - 1914》,第 9 页。

V. D. 李普曼:《维多利亚时期犹太人的经历》(V. D. Lipman, “The Victorian Jewish Background”),安妮·考文、罗格·考文编:《英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犹太人》(Anne and Roger Cowen, eds., *Victorian Jews through British Eyes*),“利特曼犹太文明丛书”1998 年版,第 16 页。

卢西欧·斯邦泽:《19 世纪英国的意大利移民:事实与表象》(Lucio Sponza, *Italian Immigr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Realities and Images*),莱斯特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7 页。

詹姆斯·A. 施米尔金:《血汗行业与血汗劳工:1860 - 1914 年的伦敦服装业》(James A. Schmiechen, *Sweated Industries and Sweated Labour: The London Clothing Trades, 1860 - 1914*),克鲁姆·海姆 1984 年版,第 35、104 - 106 页。

托德·M. 恩德尔曼:《英国犹太人,1656 - 2000》(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Britain, 1656 to 2000*),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9 页。

詹姆斯·A. 施米尔金:《血汗行业与血汗劳工:1860 - 1914 年的伦敦服装业》,第 112 页。

杰伊·M. 皮尔泽:《犹太人与“血汗劳工”大争论:1882 - 1892》,第 264 - 265 页。

杰伊·M. 皮尔泽:《犹太人与“血汗劳工”大争论:1882 - 1892》,第 259 - 261 页。

夫·班尼斯特(Joseph Banister)的反犹作家,则于190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犹太人掌控下的英国》(England under the Jews)的著作,断言英国正在受到“闪米特污流”的渗透,并且以最邪恶的方式对东欧犹太移民的卫生和健康状况进行了不实的攻击。

在诸如此类的压力下,英国官方也不得不认真面对东欧犹太移民问题。1888年2月,上院派出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血汗工场的运作情况。没过多久,索尔兹伯里政府也组建了一个外国移民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东欧犹太移民情况。怀特同时为两个委员会服务,他的主要任务是为调查寻找证据。可是,由于情况复杂,调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902年,在东欧犹太移民的涌入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和英国公民的反移民情绪空前高涨的情况下,贝尔福政府被迫组建皇家外国移民委员会,由它专门负责调查移民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其他国家控制移民的手段,为计划中的移民法提供证据和借鉴。

经过一番调查,皇家委员会认为,移民的总体健康状况良好,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携带了传染病;虽然某些行业的工人确实因为移民的到来而遇到了就业压力,但关于移民会导致失业的担心却缺乏根据;移民的子女一旦突破语言障碍,就能很好的适应英国的学校;当然,移民的确导致了他们所到之处的住房紧缺和房租上扬,而且他们的居住过于拥挤,卫生状况堪忧;此外,移民的犯罪率极高;如此等等。基于上述认识,该委员会向政府建议,没有必要为了保护劳动市场而控制(control)移民入境。不过,有必要通过立法对移民进行必要的管理(regulate)。这里所谓的管理,实际上是指对某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实行禁入政策。比如说,虽然已入境的移民在总体上是健康的,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应当把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和白痴列为不受欢迎者;为改变移民居住过于集中、并且对当地居民生活构成威胁的状况,应当设立禁居区,不许移民在那里居住;鉴于在移民中间存在着很高的犯罪率,应当对罪犯、无政府主义者、妓女、皮条客、靠公共基金维生者以及其他“人所共知的品质败坏”者采取限制入境和驱逐措施。

1904年,在皇家委员会上述建议的基础上,首相贝尔福向议会提交了一份限制性的外侨法案,以便控制移民入境。可是,丘吉尔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这一法案是不人道和反犹主义的。在他们的抨击下,这一法案被撤销了。直到1905年,人们期盼多年的《外侨法》终于出台。正如内政大臣阿里塔斯·阿克思-道格拉斯(Aretas Akers-Douglas)所言,该法令的目的只是“防止这个国家成为赤贫、患病和犯罪的外国人的收容所”。不过,总的来说,该法令的实际内容比皇家委员会所建议的还要温和。比如,它并没有对移民的居住地做出任何限制。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样的限制实行起来有很多实际困难;另一方面,限制居住权即是限制个人自由,有违英国的法律传统。再比如,它不排斥政治或宗教避难者,也不排斥准备途经英国去其他国家者。如此等等。因此,这一法令的使命更像是息

杰弗里·奥德曼:《近代英国犹太人》,第128-129页。

杰弗里·奥德曼:《近代英国犹太人》,第124页。

J. M. 埃文斯:《移民法》(J. M. Evans, *Immigration Law*),斯威特与马克斯韦尔1983年版,第4-6页;齐格·赖顿-亨利:《英国:未来的零外来移民国家》(Zig Layton Henry, "Britain: The Would-be Zero-Immigration Country"),韦恩·A. 科尼列斯、菲利普·L. 马丁、詹姆斯·F. 霍利菲尔德编:《控制外来移民:全球透视》(Wayne A. Cornelius, Philip L. Martin,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282页。

朱达·格里伯茨、爱德华·L. 格林斯坦、雷吉纳·斯坦因:《犹太史时间表:犹太历史上的重大人物及事件年表》,第342页。

J. M. 埃文斯:《移民法》,第6-9页。

事宁人,平息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紧张局势,而不是对东欧犹太移民实施反移民者所预期的那种严格控制。

《外侨法》的适用范围相当有限。因为,接受移民检查的只是大船中乘统舱的乘客,而统舱乘客少于 20 个的移民船根本不在检查之列。此外,接受检查的移民即使受到移民官的拒绝,他依然有权向移民申请局提出入境申请,争取入境成功。诚然,《外侨法》并不像一些反移民者所指责的那样形同虚设,它甚至成功地阻止了俄国革命参加者的入境。可是,总体来说,它的确是一部相当温和的法律。因此,移民的步伐只是在《外侨法》出台后受到了暂时的限制。很快地,他们又以与前些年大体相同的年均流入速度继续涌入英国,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对欧洲大陆移民、特别是犹太移民的强大阻隔作用,与当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颇为类似。当然,同样不容忽视的是,1914 年,英国又通过了一部《外侨限制法》。它给予移民官极大的权力,对外来移民实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持续 33 年的东欧犹太移民潮总算归于平息。

三、本土犹太人的反应与应对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东欧犹太人的大规模涌入,在英国本土犹太人中间引起的反响可以说更为普遍和强烈。和非犹太人一样,他们在总体上也反对,或者至少是不欢迎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居英国。和非犹太人不一样的,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切实行动,通过宣传和救济活动这两大手段,一方面试图从源头上遏制移民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把数以万计的移民遣回原籍或送往其他国家。唯其如此,有学者曾经指出,在 1905 年《外侨法》颁布之前,对东欧犹太移民定居英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既不是英国官方,也不是非犹太人的反移民运动,而是本土犹太人的救济机构。事实上,即使是在 1905 年以后,在反移民运动方面做出更大实绩,从而对移民构成最大威胁的,仍然是本土犹太人。

由于身份和地位各异,本土犹太人反对移民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就下层犹太人或犹太大众而言,反对移民的原因相对直接和简单。很自然地,和移民住在同一区域,并且和移民存在同业竞争的劳工是最起劲的反移民者。在这类反移民者当中,当然也包括一些在 1881 年之前移居英国的俄国和波兰手艺人。对他们来说,反对移民到来的理由主要在于,移民和他们持同样的手艺,势必会对他们辛苦经营的社会经济地位构成威胁。因此,本土犹太大众反对移民的直接理由与非犹太大众非常相似。

就中上层犹太人或犹太精英而言,反对移民的原因则相对复杂。首先,数量庞大并且以贫民为

T. W. E. 罗切:《锁中匙:1066 年至今的英国移民控制史》(T. W. E. Roche, *The Key in the Lock: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Control in England from 1066 to the Present Day*),约翰·默里 1969 年版,第 69 页。

吉森·L. 赫培尔:《反叛者,而非拉比:英国共产党中的犹太成员》(Jason L. Heppell, "A Rebel, Not a Rabbi: Jewish Memb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20 世纪英国史》(20 Century British History)第 15 卷,2004 年第 1 期,第 35 页。

V. D. 李普曼:《维多利亚时期犹太人的经历》,第 17 页。

大卫·费尔德曼:《1840 - 1914 年的英国人与犹太人: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第 299 页。

劳埃德·P. 加特纳:《英国的犹太移民,1870 - 1914》,第 54 页。

尽管在具体做法上,少数本土犹太精英不愿意屈就主流派,但是,在基本立场上,本土犹太精英们却相当一致,即反对或者至少是不欢迎东欧同胞的到来。真正完全同情移民并反对主流派的,只有锡安主义者。不过,锡安主义者的力量相当微弱,他们所弹奏的不和谐音调远不足以扰乱本土犹太精英的普遍意愿和基本原则。限于篇幅,本文将略去这方面的论述,只以主流派为考察对象。

主的东欧犹太移民给他们施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为在英国,犹太贫民的救济工作向来基本上由英国犹太社团自己承担,而为犹太人的慈善机构进行捐助的,都是中上层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讲,犹太贫民救济的实际承担者是为数不多的犹太精英。东欧犹太移民的持续增加,无疑使他们不堪重负。其次,数量庞大并且在各方面与本土犹太人存在较大差异的东欧犹太移民对本土犹太社团的原有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在1881年之前,英国犹太社团总共只有6万上下的人口,其中英国化的本土犹太人占大多数。可是,1881年以来东欧犹太人的大规模入境急剧地改变了这一点。当然,比人数更为可怕的是文化和习俗的差异。东欧犹太人虽然也是犹太人,但是在语言、宗教礼仪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与本土犹太人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无疑给本土犹太精英按自己的意愿同化后来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自身的东欧移民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再次,贫穷落后的东欧犹太移民极大地刺伤了本土犹太精英们的自尊心,损害了他们极为看重的本土犹太人的社会形象。他们原希望给人们以现代的印象,可是移民们却以原始的、或者至少是中世纪的面目出现。他们原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信奉犹太教的英国公民,可是在移民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却与此背道而驰。凡此种种,无疑使自认为已经成为英国体面公民的本土犹太精英们感到难堪和不安。复次,东欧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和非犹太人的强烈反应使本土犹太精英们对反犹主义充满了担忧。由于非犹太人的反移民运动的对象实际上是东欧犹太人,所以,这场运动或多或少都带有反犹主义的成份,而在本土犹太精英们看来,反犹主义上升到某种程度,必然会使原本纯粹的反移民运动殃及本土犹太人。这种结果自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一言以蔽之,本土犹太人之所以在总体上反对东欧犹太人移居英国,乃是因为他们在非常时期重视自己的利害安危胜于一切。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他们不仅不欢迎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而且从一开始就采取积极行动,一方面动用宣传工具,呼吁东欧犹太人不要向英国移民;另一方面利用众多的移民需要救济之便,把继续向国外移民或返回原籍作为实施救济的交换条件,迫使许多有可能在英国定居的移民离开了英国。

在东欧犹太人开始大规模涌入的时候,本土犹太精英普遍希望,东欧犹太人最好不要移民,而是留在家乡,改善自己的命运。最能说明上述态度的是1881年5月20日《犹太纪事报》的社论。它明确强调,俄国犹太人应当留在俄国,等待时局的好转。至于那些已经现身英国的移民,最好是把他们送往美国,或者在劝说的基础上把他们送回原籍。由此可知,随着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入时期的来临,本土犹太人很快就明确了自己的不欢迎态度。

为了从源头上阻止东欧犹太人移居英国,本土犹太人不仅从一开始就通过入境移民传递不欢迎的信息,而且从1884年起直接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犹太报刊上发布经过大拉比拿单·阿德勒批准的声明,提醒那些准备移民英国的犹太人,他们会在英国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而且在到达英国后最需要救助的前6个月里无法得到本土犹太人的救助,并呼吁当地犹太社团的领导们尽可能从

大卫·费尔德曼:《1840-1914年的英国人与犹太人: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第300页。

杰弗里·奥德曼:《近代英国犹太人》,第120页。

塞弗林·亚当·霍克伯格:《从英国遣返东欧犹太人:1881-1914》(Severin Adam Hochberg, "The Repatriation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from Great Britain: 1881-1914"),《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第50卷第1-2期,1988-1992年,第49-50页。

源头上堵住这股移民潮流。在 1886 年伦敦犹太人监护委员会(the London 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以下简称 JBG)向欧洲大陆的犹太报刊发送的声明中,英国犹太人甚至做出了如下恳求:“为了避免今后的麻烦,我们恳求德、俄、奥的每位正义同胞们为外来人口设置一道屏障,劝他们不要前往他们并不知情的国土。他们在自己的乡土上过一种令人悲伤的生活,总比在异国他乡忍受饥馑的耻辱、百万富翁的白眼、以至在赤贫中死去要好些吧。”然而,如此动情的劝阻除了表明本土犹太人被东欧犹太移民冲击得不胜其烦之外,根本达不到他们的预期目的。

不过,劝阻工作的不顺利并不足以动摇本土犹太人遣送移民的决心。如果说劝阻的目的是使东欧犹太人尽可能少地流入英国的话,那么,遣送的目的则是使已经流入英国的东欧犹太人尽可能多地离开英国。遣送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遣返,另一种是外移,即结合移民的意愿,把他们遣送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在这两种手段中,一般以遣返为主。这主要是因为,返回原籍的路费要便宜得多。因此,在英国犹太慈善机构的资助下离开英国的,有一部分人去了美国、澳大利亚、开普殖民地和加拿大等,但大多数人还是被送回东欧老家。

遣送工作主要由各慈善机构承担。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移民是贫民,在生活的逼迫下,他们会别无选择地向慈善机构求助。而本土犹太人正是利用这一点,趁机以返回原籍或外移至其他地方为交换条件,迫使移民就范。绝大多数移民在到达英国时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而根据本土犹太人的救助原则,在到达英国的 6 个月内,移民无法从慈善机构获得救济。对这些移民来说,如果他们在此期间找不到就业门路,绝大多数人早已是一贫如洗、饱受生活的折磨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自然很容易接受本土犹太人的条件,为了一时的好处,踏上返乡的旅程。因此,在遣送方面,本土犹太人不仅巧妙地利用了移民的贫困,而且刻意让他们先经受一段时间的煎熬,从而达到让他们视英国为畏途、比较容易地接受遣送要求的目的。

对新移民半年内不予救济的做法和遣送工作从 1881 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当时,救助东欧犹太贫民的事务由 JBG 下辖的曼绅豪斯俄国犹太人救济基金会(Mansion House Russo-Jewish Relief Fund,一般简称为 Mansion House Fund)独立负责。该基金会把移民截然分为两类。一类是难民,只占其中的少数;另一类是贫民,占大多数。被划分为难民者可以享受非常待遇,他们除可以得到必要的食宿安排之外,还可以学到一门手艺或得到劳动工具等。而被划分为贫民者则在半年内没有资格得到任何救济。这样做的目的,乃是防止更多的移民涌入英国。在对难民实施救济的同时,该机构还想方设法把其中的许多人送往美国和英属殖民地,并且把一些没有发展前途的人遣返。比如,在 1882 年 4 月 27 日至 7 月 12 日的遣送高峰期,利物浦的曼绅豪斯基金会用 31 艘汽船把东欧犹太移民

杰弗里·奥德曼:《近代英国犹太人》,第 114 页。

该组织是代表伦敦犹太人最高当局的核心慈善机构,成立于 1859 年。在成立之初,JBG 的全部职责是主持救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扩展了自己的工作范围,使自己变为综合性的慈善机构。这种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续至今。此外,在伦敦 JBG 成立之后,英国的其他主要地方犹太社团也相继成立了同名机构。

阿兰·艾雷拉:《人民英国》(Alan Ereira, *The People's England*),卢特里奇与基冈·保罗 1981 年版,第 191 - 192 页。

塞弗林·亚当·霍克伯格:《从英国遣返东欧犹太人:1881 - 1914》,第 53 页;大卫·费尔德曼:《1840 - 1914 年的英国人与犹太人: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第 303 页。

大卫·费尔德曼:《1840 - 1914 年的英国人与犹太人: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第 159 页。

大卫·费尔德曼:《1840 - 1914 年的英国人与犹太人: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第 301 页。

当中的 4422 名成年人、1325 名儿童和 527 名婴儿送上了去往加拿大和美国的旅程。

1882 年之后,曼绅豪斯基金会停止了上述活动。从那个时候起,伦敦和地方的 JBG 开始在遣送工作中发挥主要作用,以遣送代替救助的原则也进一步成形。除了少数被认定为因遭受迫害而流亡的人,一般移民在申请救济的时候, JBG 等慈善机构会告知他们,他们除了可以得到一张途经汉堡返回原籍的船票外,不可能得到别的救助。遣返的基本前提是通过劝说,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别无选择,当事人会比较容易地接受劝告,离开英国。但是,也有不愿意被遣返者。这些人往往会遇到比较严厉的手段,“被迫返回”。可见,在事实上,为了达到目的, JBG 等除了对遣返对象进行劝说,在必要时还会动用威逼手段。

在东欧犹太人大规模涌入英国的 33 年里, JBG 的遣返工作可以说是一贯而坚定的。1905 年,由于俄国的集体迫害特别严重,它确实一度停止了遣返政策的推行,但很快又予以恢复,并把它一直持续到 1914 年。其他一些慈善机构,如成立于 1882 年、专门负责救济受迫害的俄国犹太人的俄国犹太人委员会等也是如此。

关于被遣送国出的移民数字,缺乏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1880 - 1914 年,被各犹太救济机构送出英国的东欧犹太移民多达 5 万人。这其中应当既包括遣返的数字,也包括外移至其他国家的数字。还有人认为,在同一时期,仅被伦敦 JBG 遣返的移民估计多达 5 万人。地方各犹太社团的慈善机构也效仿伦敦 JBG 的作法,把许多东欧移民送回原籍。同一时期,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社团也对东欧犹太移民实行了遣返政策。但是,没有哪个社团能像英国犹太社团那样做到一贯和系统,遣返那么多人。即使以第一个说法为准,无论与 1905 年《外侨法》颁布后被英国官方拒之门外的几千人相比,还是与实际定居于英国的大约 15 万人相比,被遣送出境的 5 万人都是了不起的数字。这一数字意味着,若非本土犹太人一贯而坚定的排斥,在英国定居的移民很可能至少在 20 万上下。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现象之一,移民现象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气候的晴雨表,体现着有关国家或区域政治经济状况的凉热,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潮流。从前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 世纪 80 年代起陡然升级的东欧反犹主义固然是导致东欧犹太人大规模外移的重要原因,却远非全部原因,更非深层原因。可以说,在东欧犹太人外移的历史上,它更多地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基本原因。如果不把它同亚历山大三世的大俄罗斯主义和 19 世纪欧洲的移民潮联系起来,我们就只能从中得出表象和片面的结论,或者陈陈相因,以讹传讹。

从英国各有关方面的反响及应对措施可以看出,对于被动的接收国或区域来说,移民的大规模到来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或者使原有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进而导致民间反移民情绪的扩散及官方反移民政策的出台,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原因是,移民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来,而他们的到来却又不可避免地——或者至少被认为——会伤害当地居民乃至所在国家的利益。关于犹

劳埃德·P·加特纳:《英国的犹太移民,1870 - 1914》,第 42 - 43 页。

塞弗林·亚当·霍克伯格:《从英国遣返东欧犹太人:1881 - 1914》,第 51 页。

塞弗林·亚当·霍克伯格:《从英国遣返东欧犹太人:1881 - 1914》,第 59 页。

大卫·费尔德曼:《英国人、爱尔兰人、还有犹太人……英国的外来移民与少数民族》(David Feldman, "There Was an Englishman, an Irishman and a Jew ...: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in Britain"),《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 第 26 卷,1983 年第 1 期,第 198 页。

塞弗林·亚当·霍克伯格:《从英国遣返东欧犹太人:1881 - 1914》,第 49 页。

太移民在移入国所遭受的排斥,国内外学界喜欢套用反犹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仿佛只有犹太人才会有这样的遭遇。实际上,我们更应该看到,反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民族歧视,而民族歧视是到处都有的。而且,当地居民对移民的排斥,通常是以民族歧视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导致这种歧视的,往往是双方在利益层面的冲突,不管这利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抑或兼而有之。

从英国各有关方面的反响及应对措施还可以看出,时常被誉为“形散而神不散”的犹太民族有其相当复杂的一面。这当然是由犹太人的散居特点以及他们在各所在国家的客民身份造成的。对于当时英国的本土犹太人而言,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把东欧犹太移民看作是自己的同胞。另一方面,他们更愿意把后者看作是非我族类的东欧人。受这种心理的影响,他们对东欧犹太移民的态度显得异乎寻常的敏感和矛盾,且以排斥为基调。也正因为如此,在限制东欧犹太人移居英国方面,真正做出一贯努力并做出最大实绩的,既非英国的非犹太人,也非英国官方,而是已经生活在英国的犹太人。而在本土犹太人上述做法的背后,同样赫然可见利益的冲突和权衡。这是我们在认识犹太民族时通常不太注意而又不宜忽视的地方。

[本文作者王本立,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讲师。苏州 215009]

(责任编辑:张晓华)

· 书 讯 ·

沈汉所著《英国土地制度史》一书已于 2005 年 12 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全书 30 万字,定价 22 元。全书共分 16 章,主要以土地制度作为观察角度,来勾勒英国农业发展变化的线索,研究了中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末英国土地制度发展变化的这一主要阶段。而且该书一改国内学者研究英国农业史时偏重生产力或纯经济的研究倾向,而注重对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

马丁所著《瑞士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已于 2005 年 5 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全书 26.5 万字,定价 26 元。全书共分 12 章,主要从瑞士的国家形成和经济崛起等基本历史线索出发,全面地阐述了瑞士的现代化进程、基本特点,及其成功的经验。并且重点介绍了瑞士首创的“全民公决”、中立外交政策,以及循环经济等独具特色的发展策略,着力展现了瑞士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Impact and Response :
The Emigration Tides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and the British Society (1881 - 1914)

Wang Benl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migrations of Europeans in the 19th century , an unprecedented massive emigration movement of Eastern European Jews to Britain accompanied by the enforcement of Great Russian policies in Russia , which aroused accordingly a rare anti - immigration movement from the lower level upward in Britain. It '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that , the native Jews of Britain were not only as a whole opposed to , but also active from the beginning in resisting the large scale immigration of their Eastern European siblings , and thereby they actually made greater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in anti - immigration movement than did the Gentiles and the authorities of Britain.

A Study of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Zhang Shuqing

The Jews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Ages lived in the communities , which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ves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paper presented here focuses on the major function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rganization , such as coordinating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authorities , collecting the king 's tax ,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the Jewish people and securing of internal discipline and order with a high level of cohesion by supplying certain essential religious and social services to its membership. It was the communities that made the Jewish people not only survives but also preserves their distinctive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of the Massachusetts Miracle :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Oldest Industrial Re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n Yu

Massachusetts , the oldest industrial re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 suffered serious decline in a long perio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regional economy gained strong momentum and revitalize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ts revival draws the worldwide attention and was marked by "Massachusetts Miracle ". The successful restructuring is driven not only by the booming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 but also by the rapid growth of knowledge - based service sectors. The paper presented here is an attempt to study the recession of Massachusetts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revival in the 1990s , and to reevaluates the nature of restructuring and to examine the experi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ssachusetts.